

中医基础教育的当代省思

——由认识论角度反思中医基础教育

● 梁 苘*

摘要 中医是我国的一门国粹,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份瑰宝。而中医基础教育作为培养后继人才的重要环节,在中医事业的继往开来上起着固本延真、启蒙开新的作用。文章通过阐述中医理论传承和基础教育的相互关联,结合当前中医基础教育面临的背谬和困境,尝试探讨中医教育的应变思路和调整策略,希冀藉由当代认识论的认知视角,深刻反省中医基础教学存在的不足,以获得中医基础教育固本强基、与时俱进的启示。

关键词 中医基础教育 理论传承 认识论问题 认知研究

中医基础教育是中医理论传承的关键环节和必要手段,它在中医事业薪火传延、承前启后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步入现代,中医教育事业在迅猛的学科分化大潮冲击下,正面临教学理论与临床实践日益脱节的尴尬局面。如何既能保持自身特色、积极创新,又能顺应时代潮流、与时俱进,从而实现中医教育理论和中医基础理论的完善和创新,乃至实现中医事业的繁荣与腾飞?这已经成为祖国中医事业发展的重要问题,理应引起学界有关专家、学者的高度重视。

1 中医理论独特传承方式与中医基础教育发展状况的矛盾

与现代西医学迥然有别,传统中医学在理论传承和学科教育

上独树一帜、经久不易。这便是中医颇具特色的“以师带徒”和“口传心悟”。有道是“师傅领进门,修行在个人”。学问做得是否扎实,技艺练得是否娴熟,很大程度在于工徒自身的勤奋努力和参透领悟。

历史上诸如扁鹊、华佗、张景和孙思邈等大医,其致力求知、拜师习医的曲折经历,每每给后人留下不少神奇感人的传说、佳话。当今国内中医领域的著名学者,如任应秋、邓铁涛和刘渡舟等老先生,同样有着说不完、道不尽的往昔峥嵘。授业解惑的教师,尤其从事中医教学的老师不仅得学富五车、循循善诱,还要慧眼识珠、适时提点。一位医术高明、桃李芬芳的老中医,正如望穿秋水、可遇难求的导师贤哲,以身体力行之风范,立泽被后世之功业。有鉴于此,医

家的师承及家派业已成为了解其人其艺的重要窗口。

任何一门理论或学说,都离不开固有的方法论(按:关于中医教育方法论和中医人才培养问题,李致重教授已经作出切中肯綮、入木三分的分析和论述。参见李致重:《中医教育的三个重要环节(1)——兼论中医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》,沈阳:《辽宁中医学院学报》,2003年第2期,第83-85页;《中医教育的三个重要环节(2)——兼论中医人才成长的一般规律》,同上刊,2003年第3期,第196-198页。)和认识论基础,中医基础教育也不例外。建国以来,中医基础教育取得一系列可观的成绩,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中青年接班人,为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输送了许多优秀人材。但客观现实告诉我们,缺点与不足同样存在,而且某些方面的情形不容乐观。直面现实、正视不足,是了解中医传承与发展问题的客观前提,而只有反躬自问、冷

* 作者简介 梁 苘,男,医学博士。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会员。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医学基础与中医基础教育。

● 作者单位 广州中医药大学(510405)

静剖析,不离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要则,才可能为中医基础教育找到固本延真的有益启示。

1.1 手脑分离、重测轻诊——当前令人担忧的中医教学倾向

随着时代的发展,尤其学科分化浪潮的洗礼,中医的临床诊察和理论研究日益分离,彼此相对独立。于是出现以下鲜明对比,有些中医师虽然授课时口若悬河、头头是道,可一旦上了临床对着具体的病证,就支支吾吾、闪烁其词;而另一些中医师即便在临证诊疗上颇有心得,甚至具备华佗再世、扁鹊回春之功,但囿于当前考核、评级体制等客观限制,加上自身表达、理论综合和思维创新能力存在缺憾,只能怅然感慨、嗟叹不已。试问如此师资,如何做好日常教学工作,完成传道育人的使命?又怎能满足培养优秀中医人才的需要?

中医院购买、引进先进的诊疗仪器、设备,可能对中西医结合诊疗有所裨益,本来无可厚非;但若淡化甚而抛弃“四诊八纲”等传统中医学艺,重测轻诊,甚而以测代诊,真可谓舍本逐末、南辕北辙。诚如邓铁涛老先生所言,“中医医院的仪器设备越来越越好。但必须说明的是借用西医的诊断仪器和方法,其目的在于发展中医的技术与理论,使我们的经验总结更易于为人们所接受。”^[1]

1.2 造就精英和惠泽民众——中医基础教育目标的两难

古往今来,斗转星移,中医培养人才的指导思想却岿然不动,即宁缺毋滥、以一当十;其思想精髓体现为成就“苍生大医”,而非“含灵巨贼”^[2]。拜师学艺,体悟践履,来不得半点含糊;施针处方,疗疾

除病,要不得半点马虎。正因为如此,莘莘学徒纵然叩谒于一方名医,可经年累月、寒暑易节,只有那“性笃行贞、心无怨贰”之人,方可“升堂入室”;若然有人萌生懈怠、怨恚,抑或抵受不住荣华利禄之诱惑,或抗拒不了钱财美色之吸引,终将前功尽弃、半途而废。所以先人有云:“为者如牛毛,获者如麟角”。^[3]

试看今日之青年学子,多藉全国本科教育扩招之风潮而纷纷步入大学殿堂,中医院校也不例外。本科教育主要以院校教育为培养目标,但中医的本科教育似乎未能顾及自身特质,在科目选择和学习上,不尽合理的课程设计和考核方式令许多学生本末倒置、喧宾夺主。^[4]走入中医院校校园,经常发现许多晨读的学子在湖边、树下,卖力起劲地朗读、背诵,诵读的不是中医经典条文,而是外语;而在日常生活中,时髦流行的“洋泾浜”和网络用语俯拾皆是,老师听起来如坠云端、无可奈何。

理论见之于实践,实践反过来为理论提供供给。中医的理论与临证密不可分,交织互渗,中医教学当然离不开临床实践。

让接受中医基础教育的学生,有准备地、有步骤地进入临床实习或见习环节;让学生们在临证实践中学以致用、触类旁通,这样既能加深学生对中医理论的认识,也促使其尽快熟悉相关的中医技能,从而为往后走上工作岗位打下基础。可全国本科扩招的现实和中医院校办学规模之间的“鸿沟”,于短期内难以弥合。眼下,同时具备丰富的教学、临床经验的医师少之又少,而学生人数相对较多,这就形成僧多粥少的不利局面。另外,由于学生在综

合能力、知识背景等方面存在个体差异,即便让大批本科学生一窝蜂地上临床、跟导师,也不一定顺水行舟,轻车熟路,反而可能有违初衷、差强人意。

理论传承有其自身特点,学科教育也有一般规律。知识内容的传授,必须注意知识背景的培养和思维方式的转换等因素。教育如果不循序渐进、因势利导,给学生讲授的内容零散、杂乱而琐碎,那么教育的效果将事倍功半、得不偿失。

2 中医基础教育存在的主要症结

中医基础课程教材是传授知识、阐发医理的重要桥梁和主要媒介,而诸如阴阳、五行和精气等中医基本范畴,在引导学生理解相关理论和诊疗思路等方面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,并发挥着基础性作用。但一些教材在使用现代科学语言表述上述范畴时,语言表达往往欠缺简明、凝练,而显得拖沓冗长、前后不一。另外,教材关于上述范畴的表述,多由具体实物出发,着力表现其“物质”、“实体”的一面;相反却淡化,甚至忽略基本范畴指涉“功能”或“属性”的另一面。殊不知,这被淡化、忽略的另一面,恰恰系中医基础理论的要紧和旨归。^[5]

如关于五行概念的解释,不少教材将五行解释为“五种基本物质或基本元素”,这不仅未能摆脱“还原式”思维的影响,还贬抑了以五行为基本框架的“五行关联”思维模式的作用。因为“五行,是中国人的思想律,是中国人对于宇宙系统的信仰;二千余年来,它有极坚固的势力。”^[6]

“五行关联”思维模式并不局

限于具体事物的特定属性,而使用生克乘侮关系来联结“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”五个基本符号,五种基本的能量状态(相位)类似物或五种基本的程序^[7]。该模式充分体现简约、经济和动态等优点^[8],具有重要的认知意义。

中医院校教育在第一学年,就陆续给学生开设许多西医基础课,如人体解剖学、生物化学、组织学与胚胎学、生理学、病理学和药理学等。这些课程占用课时多,知识点分散、琐碎,章节松散且说理不够透彻。学生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,去啃书本,背定义和记结论。这么一来,如何保证似易实难的中医基础课程的学习?

而最关键的是西医基础课程的实验教学,足以令中医基础课程望尘莫及。西医课程的实验直观、明晰和生动,其中贯穿着西医精益的学理特质和缜密的思维特征。在学生们普遍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和浸染的心灵里,西医课程的实验先入为主,轻易地扎根、发芽。紧随实验而来的是西医学的医理分析和阐发,由于医理分析和阐发表述清楚,层次分明和推理融贯,学生感觉容易接受并不自主地在许多病例分析中套用西医学的思路。

而中医课的实验却常常借用现代科技的手段,试图以“客观、规范和精确”的面貌示人,可似乎总给人一种适得其反、邯郸学步的感觉。有教师在授课时,将中医的阴阳五行、“四诊八纲”和辨证论治与西医的解剖病理、视触叩听和循证分析简单比附。这不仅没能收到预期教学效果,反而还给学生的理解带来不少困难。此外,基础课程那抽象、玄妙的范

畴和空洞、枯燥的讲解,即便当时在学生脑海中留下丝缕印迹,可随着时光的流逝,中医的“四诊八纲”和辨证论治等要诀也将仿如昔日故人,欢声笑语已不再且名物遗风不可寻。

中医理论的神髓主要蕴藏于流传千古的中医经典。先人有言:读经开智。经典在启发心智、指导诊疗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。勤读中医经典,理论联系临证是学好中医的不二法门。而阅读中医经典,自然离不开医古文及相关文化常识。在许多本科学生的眼里,文绉绉、干巴巴的古文显然比不上时髦、实用的英文。他们宁愿朗读ABC,也不愿吟诵“之乎者也”。在许多当代年青人看来,古文仿如隔世陈物、经年老历,既晦涩难懂,又拗口别扭。

如此看来,营造一个研习传统文化的氛围,鼓励一种使用今古汉语的习惯,便成为中医基础教育的必要津梁。只有这样,学生才能恰如其分地理解典籍条文的深意,从而切中肯綮地领悟岐黄医道的底蕴。

3 中医基础教育的教改展望

3.1 关于五行学说的认知意义——中医基础教育的关键 组成五行图式的基本符号(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),奇妙地构成一个完备、充分的体系。有学者曾就五行体系导出严格的数学证明,并进一步归纳、总结五行学说的理论思维特征。即五行体系构成一个稳态反馈自控系统;五行之间的生克关系具有动态稳定性;五行学说具备准公理性质^[9]。

需要指出的是,在五行关联图式中,每一个基本符号的概念内涵

是待定(或欠定)的,而符号之间的联系和顺序才是关注的焦点。由于五行关联图式中两行之间的关系是单向(如 $A \text{ 克 } B \neq B \text{ 克 } A$)的,那么由相生(或相克)的其中一行至另一行,需要引入“权”(weight)概念来反映因选择不同欧拉路(Eulerian path)而造成的结果。即结合有向的欧拉回路(Eulerian circuit)^[10]来推理五行图式得出的可能结果。

正因为中医理论借用五行学说的演化思想,才成就了著名的五脏休王理论。^[11]因此,五行学说在中医学探寻病因、订立治则方面,起着提纲挈领、化繁就简的作用。如根据口苦胁痛,头痛目赤,伴舌红苔黄、脉弦数有力,可推断肝经实火上炎,须清泻肝火;而肝旺易侮脾土,故在开处方药时宜考虑顾护脾胃,若脾素虚,则须清肝火兼实脾土。另外,“培土生金”“滋水涵木”“泻南补北”治则正是中医辨证思维应用五行学说的体现。

3.2 中医辨证论治推理的认知模型——中医教育说理的保障 以往,科学界与哲学界存在一种根深蒂固的看法,即将科学研究或科学发现中的推理与古典逻辑中的论证、逻辑等量齐观。而关乎科学推理的理论,传统上仅限于句法形式上的演绎论证和归纳论证。^[12]而许多科学家、科研工作者在研究过程中,开展了富创造性的认知活动、实践,做出了成效卓著的贡献。但其中认知活动和认知过程牵涉的推理机制,却长期得不到合理解释和充分认识。

直至上世纪五十年代,在布雷斯维特(Richard Braithwaite)、海茜(Mary Hesse)和赫顿(Ernest H. Hutten)等人的努力下,就科学理

论及科学发现牵涉的推理机制,产生了崭新的解读方向。^[13]他们把科学理论看作假说—演绎系统,并发掘认知模型的类比特性在溯因推理(abductive reasoning)中的意义。于是科学理论的构建和科学发现的机理,得到了不同于从前的全新认识。

溯因推理源于皮尔士(Charles S. Peirce)的杰出贡献。他在总结亚里士多德(Aristotle)和康德(Immanuel Kant)观点的基础上,将溯因推理(或称假说推论)解释为由大前提和结论推出小前提的过程,即三段论第一格 AAA 式的一种逆推形式。^[14]溯因推理被大量应用于科学探索、科学发现,为创立假说,寻求原因做出重要贡献。而中医的诊疗实践,尤其名老中医的诊疗实践,具备溯因推理和类似科学推理的过程,并且伴有探索式、启发式等特征。故在重新审视老中医诊疗过程(主要体现为医案或病案)的同时,应该结合计算机辅助诊疗系统[如专家系统(expert system)]的相关研究,来进一步探索中医解释病证、开方处药的认知机制。这既有利于收集、整理名老中医成果,又为继承、发扬其诊疗经验开辟了道路。

3.3 中医典籍文献的整理和经络、藏象的基础研究——中医基础教育的基石 中医学有许多典籍文献亟待整理、修缮,特别是关于人体内部脏腑结构的《五脏图》^[15]、《内外二景图》^[16]和《存真图》^[17]等等。这些散佚、流失的重要文献,对于阐明中医的解剖、生理和病理等内容具有重要

的意义。如能认真考释上述文献,集结出版相关内容,相信将对中医基础理论和中医基础教育均有很大裨益。

中医的藏象学说,历来在中医基础理论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惜其阐发不清,说理不明。而被学界寄予厚望的“五脏相关理论”课题研究^[18],希冀在邓铁涛教授带领和主持下,为藏象学说的发扬光大做出更大贡献。

经络学说系联系藏象学说和辨证论治的关键环节,关于经络穴位的物质基础和生理功能,国内已经涌现了许多的研究成果和论文评述。当中尤以费伦教授领导的课题组进行的探索^[19]为重要。展望不久的将来,经络的实质及功能联系会愈发明晰、透彻,这将促进 21 世纪的生命科学研究,并为中医教育事业的固本延真、兴旺发达注入源源不绝的活力。

中医学博大精深、绵延千古,虽历经风雨磨难,依然岿然不倒。中医基础教育以启蒙传统、薪火传承为鹄的,在中医事业的继承和发展中起到固本延真、革故鼎新的作用。相信在引入当代认识论的崭新思路后,中医学定能焕发青春、走向辉煌;而与时俱进的中医基础教育,将充分利用传统文化的丰厚给养及现代科学的创新理念,为振兴中医、繁荣中医事业做出更大贡献。

参考文献

- [1] 邓铁涛. 中医学之前途[A]. 邓铁涛. 耕耘集[C]. 上海:上海中医学院出版社,1988:15.
- [2] (唐)孙思邈. 备急千金要方·大医精诚

- [M].
- [3] (晋)葛洪. 抱朴子内篇校释·极言[M].
- [4] 顾海兵. 中国公共外语教育反思[N]. 南方周末,2004-9-23,(B15).
- [5] 张其成. 中医现代化悖论[J]. 中国医药学报. 1999,14(1):6-7.
- [6] 顾颉刚主编. 古史辨(第五册)[M]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2:404.
- [7] [英]李约瑟. 中华科学文明史(第一卷)[M]. 柯林·罗南改编,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译. 上海:上海人民出版社,2001:152.
- [8] 胡化凯. 五行说——中国古代的符号体系[J]. 自然辩证法通讯,1995,17(3):51-55.
- [9] 胡化凯. 五行说的数学论证[J]. 科学技术与辩证法,1995,12(5):41-42.
- [10] [美]韦斯特. 图论导引(英文版)[M]. 北京:机械工业出版社,2004:26-30.
- [11] 胡化凯. 五行说——中国古代的符号体系[J]. 自然辩证法通讯,1995,17(3):54.
- [12] [美]南希·J·纳西希安. 科学中基于模型的推理的认知基础[A]. 李平、陈向主编. 科学和推理的认知研究[C]. 南昌:江西人民出版社,2004:356-357.
- [13] Daniela M. Bailer-Jones. 追踪科学哲学中模型的发展[A]. [意]马格乃尼,等主编. 科学发现中的模型化推理[C]. 于祺明,等译. 北京: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1:29.
- [14] Ilkka Niiniluoto. 溯因推理和几何分析——评 Charles S. Peirce 和 Edgar Allan Poe [A]. [意]马格乃尼,等主编. 科学发现中的模型化推理[C]. 于祺明,等译. 北京: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1:257-259.
- [15] 靳士英. 五脏图考[J]. 中华医史杂志,1994,24(2):68-77.
- [16] 靳士英. 朱肱《内外二景图》考[J]. 中国科技史料,1995,16(4):92-96.
- [17] 靳士英. 靳朴《存真图》与《存真环中图》考[J]. 自然科学史研究,1996,15(3):272-284.
- [18] 马定科. 中医五脏相关理论研究课题启动[N]. 中国中医药报,2005-11-4,(1).
- [19] 费伦,等. 经络物质基础及其功能性特征的实验探索和研究展望[J]. 科学通报,1998,43(6):658-672.